

〈論說〉

從「遺民」到「新民」

——朱舜水與〈遊後樂園賦〉

鄭 毓瑜

一、「發現」遺民

1880年，黃遵憲偕同日本友人，到東京名勝「後樂園」遊賞。作為滿清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的使館參贊，黃遵憲充分發揮古來所謂「行人（外交官員）」紀錄異國山川風物、土俗人情的職能，但是遊賞「後樂園」卻不僅是紀錄眼前所聞所見，反而是重新「發現」入清以來被掩蔽的明末遺民朱舜水，而這距離朱舜水與鄭成功北伐失敗後到達日本的1659年，或是在日本寫作〈遊後樂園賦〉的1669年，都已經是兩百多年後了。

朱舜水，本名朱之瑜，字魯瑣，明神宗萬曆28年（西元1600年）出生於浙江餘姚，在日本期間以家鄉的「舜水」為號，以方便稱呼。早年於崇禎、弘光以及隆武年間屢次為朝廷所徵聘，但是朱舜水眼見當時南明氣勢危殆，更急迫的應該是求得扶助明室的外援，因此輾轉到日本或安南等地交涉，對於薦舉、徵召都沒有接受。後半生要從1659年說起，當時鄭成功所率領的南明隊伍，曾經進逼南京城，卻因為一心求議和，而未能及時化解清軍三番兩次的突襲，爾後鄭成功退守台灣，朱舜水則被迫東渡日本。不同於前幾次是為了藉助外邦援兵以恢復明朝國力，這次在無力回天的絕境下渡海，再也無路可出，幸好當時師事舜水的安東守約及其友人，極力奔走，終於在日本鎖國時期破例讓舜水居留長崎，⁽¹⁾成為流落異邦的亡國遺民，也是千古以來真正能「不食周粟」的海外遺民。

黃遵憲可以說是入清以來具體介紹朱舜水遺留在日本後半生的第一人，

(1) 〈與陳遵之書〉中，舜水自言「日本國之禁，三十餘年不留唐人，留弟乃異數也」，引自湯壽潛刊、馬浮編《朱舜水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63），頁13。本文所引朱舜水文章皆出此書。

在《日本雜事詩》中稱揚朱舜水是「海外遺民竟不歸，老來東望淚頻揮。終身恥食興朝粟，更勝西山賦采薇」；⁽²⁾而遊賞「後樂園」之後賦詩，更說：「夷齊西山不可得，欲以此地為桃源」，⁽³⁾這讓人想進一步追索，朱舜水是被迫流亡日本，為何黃遵憲卻認為如入桃花源？又是怎樣的一種處境與心境轉折，讓朱舜水在絕望中重新看到隱隱有光的前路？

二、越界的文化織錦

明永曆十三年（己亥 1659）鄭成功北伐失敗後，朱舜水復至日本，不同於前幾次是為了藉助外邦援兵以恢復明朝國力，而是熟知一時之間「聲勢不可敵，壤地不可復，敗將不可振」，留在內地只有「毀冕裂裳，髡頭束手」從清朝之俗，於是決定蹈海東渡，以全志節。⁽⁴⁾當時師事舜水的安東守約及其友人，極力奔走，希望在日本鎖國時期能破例讓舜水居留。⁽⁵⁾確定獲准居留長崎成為亡國遺民⁽⁶⁾後，〈答釋斷崖元初〉⁽⁷⁾敘及當時心情：「僕以中國喪亂，往來通播，蕩搖於波濤中者十七年，去冬方得暫借一枝，棲息貴邦」⁽⁸⁾，在「暫借」的前提之下，選擇流亡日本之初並沒有終老的打算，朱舜水說留

(2) 引自鍾叔河輯校《日本雜事詩》（長沙：岳麓書社出版，1985）（廣注）「71、明室遺民」詩後注云：「亡國遺民，真能不食周粟者，千古獨渠一人耳」，頁668。

(3) 見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三〈庚辰四月重野成齋岩谷六一日下部東作蒲生綱齋岡鹿門諸君子約遊後樂園園即源光國舊藩邸感而賦此〉一詩，頁252。

(4) 以上敘述及引文，參考日人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朱舜水全集》附錄，頁318-320。至於鄭成功北伐失敗的原因，〈與安東守約書〉曾提及軍中「紀律未明，上情不能下究」，又「藩臺（鄭成功）似謂虜在目中，徒使英雄頓足耳」（全集，頁67），說明了驕縱渙散的明軍從此一蹶不振、無力回天的絕境。

(5) 《中國歷代思想家》（臺北：臺灣商務，1978）第七冊《朱之瑜》敘及「日本正當鎖國時期，不許唐人留居本地」，賴橋本著，頁7。〈與陳遵之書〉舜水自言「日本國之禁，三十餘年不留唐人，留弟乃異數也」（全集，頁13）。

(6) 〈答明石源助書〉（全集，頁35）舜水自稱「不佞雖亡國之遺民，來此求全…」，篇中有「前年至廈門，赴國姓之召」，「赴國姓之召」為1659年，可見此書作於確定留居長崎後的1661年，而與〈答釋斷崖元初〉所述心境一致。關於朱舜水事蹟及作品系年，部份參考李魁平《朱舜水》（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所作「朱舜水年表」，頁267-282。

(7) 引自全集，頁18。

(8) 共「十七」年是從崇禎帝死、甲申（1644）變後至於辛丑（1661）年，「去冬」獲准留居長崎，即指1660年。參考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庚子（永曆十四年）」下云「冬間，在長崎賃廡定居」引〈答釋斷崖元初書〉所附按語。（臺北：中華書局，1957台一版）頁29。

寓期間只想「閉門掃跡」⁽⁹⁾：

所冀天下稍寧，遄歸敝邑，本非為昌明儒教而來。生於聖道榛蕪之日，而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若以僕之荒鄙而欲倡明絕學，猶以管蒯之朽索，繫萬鈞之石，垂之千仞不測之懸崖，其不絕而墜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幾近相同的字句又出現在後來〈答安東守約〉的書信裡，「前答他國佛者」云云，同樣是朽索繫石必有不測之禍，同樣申明「不肖本為避難，初非為倡明道學而來」⁽¹⁰⁾。

為什麼反覆申明自己沒有「倡明儒教」之意？其實留寓長崎之前，舜水早因與長崎譯者完翁及其所引介的安東守約彼此相知相惜，而對於儒學復興於域外有過想像。隨鄭成功北伐前一年（1658），舜水於廈門〈答安東守約〉⁽¹¹⁾書中，就認為「聖賢踐履之學」在中國已是衰微之「世季」，但是在安東守約身上卻預見「開闢而首出」的希望，所以他他如此勉勵到：

貴國山川降神，才賢秀出，恂恂儒雅，藹藹吉士。如此器識而進於學焉，豈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

而在爭取居留或剛剛確定獲准居留的時期，否認或放棄原先有過的念頭，除了文字兩度指出的「貴國又處極重難回之勢」，可能是針對日本當時佛教盛行，沈錮難起，⁽¹²⁾像是世俗普遍相信超度、極樂之說而與儒家講求禮法制度明顯不同以外，⁽¹³⁾還有更根本的原因是一旦出奔流亡，跟隨著朝代、疆域失去的是自己原本確定的身分，與依據這個身分所規劃的人生志業。流亡者的憂憤因此是在於眼見一切逐步失去的不甘不捨與難以拉挽，這個時候任何曾經抱持的志業都成了無根空想。居留長崎第一年（辛丑1661），舜水作〈陽

(9) 「閉門掃跡」是藉由無所交接傳達心繫故國的志意，《南史》卷69〈沈炯傳〉載沈炯於魏剋荊州後被擄，「以母在東，恆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卻掃，無所交接」（臺北：鼎文書局，1980），頁1678。

(10) 見全集，頁80-81。

(11) 見全集，頁74-75。此信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繫於「戊戌（永曆十二年）」下，並認為此書「表示欲昌明儒學於域外之意」，頁22-24。

(12) 題〈聖像—子在川上圖〉曰「瑜今年從交趾復來日本，得崇信仲尼者三人焉。…然其俗尚浮屠，千年沈錮，…」，全集，頁280。

(13) 比如後來〈答中村玄貞問〉說中國治喪，「浮屠不與」，所謂超度升天堂、不超度則沉淪地獄，皆愚弄子弟之迷信（全集，頁200），〈答釋斷崖元初書〉也說到儒、佛之爭，「不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何為徒爾紛紛哉」（全集，頁18-19）。

九述略》⁽¹⁴⁾由親身經歷剖析「致虜之繇」、「虜勢」、「虜害」與「滅虜之策」，其中或是對於「莫大之罪，盡在士大夫」激切的指斥，或是對於「逆虜猥亂中華，憲綱掃地」的痛心疾首，混雜著眷戀與失落是朱舜水面對遺民身分的起伏難平。

然而三年後⁽¹⁵⁾，當小宅生順欲薦舜水於水戶侯源光國，情況就有了改變。〈答小宅生順問〉中，對於講學於江戶，舜水雖然自謙「才德菲薄」、堅持「不論祿而論禮」，仍憂心「貴國惑於邪教，深入骨髓，豈能一旦豁然」⁽¹⁶⁾，但是同時所謂「(聖人之學)此事必君相極力主持之」，又「貴國主讀書好禮，雅意欲興聖人之學，必有非常之識，亦非今日可遙度也」，明顯對於儒道傳播萌生些微希望，而原本堅持「非為昌明儒教而來」的心情有了鬆動。這也可以由舜水與安東守約的書信中看出：

故欲圖十畝之園，抱甕灌之。在長崎輻輳之地，足以自給。

不佞於重門高堂，居之而無媿色，華門斗室，安焉而無戚容。…灌園之舉，須江戶事成之後。⁽¹⁷⁾

「抱甕」、「灌園」皆隱居田畝、躬耕自給之意，⁽¹⁸⁾這應是激切憤慨之後，自我調息的療傷止痛；但長崎居留不久又說灌園之舉須在「江戶事成之後」，可見舜水遺民心境的再度轉折，東行之事已然確定。

梁啟超說「江戶禮聘，實先生(舜水)全生涯之一轉捩」⁽¹⁹⁾，當然，會有這轉捩點與源光國本身的人品作為、對待舜水的態度都有關係。德川光國是德川家康之孫，與第三代大將軍德川家光是堂兄弟，繼承父親德川賴房之藩位，為第二代水戶侯。當時以本家親藩位居宰府，好學勤政，希望以文德治平天下。⁽²⁰⁾對於源光國的知遇，舜水如此說到：

(14) 引自全集，頁294-302。篇末自署「辛丑年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拜述」。

(15) 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繫舜水與小宅生順答問書札於甲辰年(永曆18年，1664年)，頁39。

(16) 引上分別引自全集，頁205、202。

(17) 皆引自〈答安東守約書〉，全集，頁78、81。

(18) 如《莊子》〈天地篇〉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引自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0年，頁433)；《史記》〈商君列傳〉趙良語商君曰「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引自卷六十八，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頁2235)。

(19) 《朱舜水先生年譜》，頁39。

(20) 以上關於源光國的簡介參考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甲辰」下所述(頁39)及王進祥《朱舜水評傳》第二章弟友記「七、德川光國」(臺北：臺灣商務，1976)，頁79。

不佞蒲柳之姿，迂拙之性，誠哉齊門之瑟也。不知何以辱水戶上公知遇，事事出於純誠，雖累牘不能盡，獨媿無以報稱耳。上公負特達之資，而恭儉禮下，使得為所欲為，豈惟一變至魯，雖至於大道之行，亦自無難。…東土雖云荒瘠，雅不及於舊邦，若果能真心為之，世無不可教化之地。(21)

源光國禮賢之純誠，由不敢稱其字「魯瓊」，而再三詢問是否有庵齋之號，最後朱之瑜只好以家鄉舜水為號以方便稱呼，這件小事即可得知。(22)地異俗殊而又與親友生別，源光國的敬重體己，深深感動了朱舜水；(23)到江戶第二年，寫給摯友陳遵之信中，(24)又描述了源光國如何令人信服的盛德：

上公乃為當今之至親尊屬，封建大國，列為三家，聖德仁武，聰明博雅，從諫弗拂，古今罕有。…上公讓國一事，為之而泯然無跡，真大手段。舊稱太伯夷齊為至德，然為之而有其跡，尚未是敵手。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做此三家村語。若如此人君，而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立致雍熙之理。…弟於如許大功名大權勢，棄之如敝屣，逃之如沒溺，豈今墓木已拱，乃思立功異域？但遭遇如此，雖分在遠人，亦樂觀其德化之成也。

在這裡朱舜水用一個非常具體的事例—如同伯夷、叔齊的讓國來說明光國腳的德行。夷、齊原為孤竹君二子，因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而相繼去國，(25)這大概是用來譬擬源光國身為幕府親藩，位居宰輔，但絲毫沒有權門專柄的非分之圖；尤其因朱舜水認為史書最能體現義理人情，(26)光國於是集合學官編修《大日本史》，貫串全編最重要的觀念就是尊王斥霸以正君臣名分。(27)但是自

(21) 引自〈答奧村庸禮〉，全集，頁88。

(22) 見〈與安東守約書〉，全集，頁72。

(23) 〈答吉弘元常〉「國變以來，倏忽分地，人情難割，…地異俗殊，唯有上公推赤心，置人腹中」，全集，頁66。

(24) 到江戶第二年（1666），源光國以舜水老病須人服事，勸其喚孫兒前來，故舜水寄書二封，其中一封即〈與陳遵之〉，其中有「去年六月，應宰相源上公之招，來至江戶」，全集，頁12-13。

(25) 參見《史記》〈伯夷列傳〉卷一（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頁2123。

(26) 〈與奧村庸禮〉「中年尚學，經義簡奧難明，讀之必生厭倦，不若讀史之為愈也。資治通鑑文義膚淺，讀之易曉，而於事情又近，日讀一卷半卷，他日於事理膾合，世情通透，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繇此而國語而左傳，皆史也，則義理漸通矣」，全集，頁87。

(27) 參考《朱舜水評傳》第二章「七、德川光國」，頁81。

己就是幕府本家，不能明白倡言，因此藉助史書編撰體例，在《大日本史》立〈將軍傳〉，模仿世家或藩鎮列傳之例，傳播尊王思想。⁽²⁸⁾朱舜水認為源光國這番不露痕跡的作為，甚至比夷齊高明，換作生於中國必然成就和樂治世，足以打破今不如古、外國不如中國的世俗陋見。末尾他表明，早年三番兩次逃避明朝徵詔，棄功名如敝屣，如今為光國卿所用，其實不是垂暮之年反而專意「立功異域」，而是「樂觀其德化之成」。不願追求功名是一直以來未變的個人心志，但是，舜水在這裡明顯將文德教化置於轉化個人心志與超越國族⁽²⁹⁾界域的地位；江戶之行的重要性也正在此，它提供一個新的相對於中國的觀看視野，足以擺脫亡國遺民後無可顧、前無可望的流亡狀態，而發現自己正參與一個連續不絕、無限擴展的文化流脈。

三、當年「後樂園」

《朱舜水全集》中除了首卷收錄早年詩作十五首，卷二辭賦僅得作於安南的〈堅確賦〉及〈遊後樂園賦〉兩篇，其餘各卷全為答問、書啟、箴銘等應用文體。而〈堅確賦〉作於丁酉（1657）三月為堅持不事安南的明志之作，〈遊後樂園賦〉篇首標誌遊園時間是「己酉春，三月十九日」，距離朱舜水隨鄭成功北伐失敗（1659）後流亡日本已經十年，距離乙巳年（1665）源光國迎舜水至江戶則有五年，可以說是朱舜水赴日後唯一抒情之作，也是倡行聖教或聖人之學，重新尋得生根萌芽的契機，而自亡國遺民成為另一個盛世的新民的人生風景。

位於東京小石川的「後樂園」，是從源光國父親德川賴房時代開始興建，「當時園池既模仿清水、音羽等地的景致，並依賴房卿要求，命名為小廬山」；賴房卿逝世後，源光國繼續修建工作，並常常在園內舉辦詩文雅宴，又依據朱舜水的指導，加入了許多中國風味的園景，「建築從前沒有的唐門、

(28) 此處參考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73、愛國志士」下所引《日本國志》〈國統志〉及《人境廬詩草》卷三，以及黃遵憲之按語。（湖南：岳麓書社，1985），頁669-670。

(29) 「國族」一詞出自舜水〈安南供役紀事〉所謂「虜氛未滅，國族難歸」，全集，頁303。

圓月橋、文昌堂、得仁堂」等。⁽³⁰⁾在日本古典園林史上，後樂園是江戶初期「大池泉、大迴遊」式諸侯庭園中建築年代最早的代表典型。⁽³¹⁾所謂「池泉」、「迴遊」型式是指結合舟行與步行雙重遊賞趣味的庭園；池泉部份早從六世紀末（飛鳥時代）開始就受中國秦漢神仙傳說的影響，建築蓬萊仙島作為觀賞中心，池泉周圍廣大園林則設置許多模仿自名勝（尤其是中國名勝，如後樂園的廬山、西湖）的縮景或亭榭，然後用許多複雜的迴遊道聯繫起這些景點。⁽³²⁾這樣一座園林，可以近觀、遠眺，可以移步換景、可以端坐遠想，來來回回仔細遊賞，彷彿隨時變換節奏的音樂宴饗。

己酉年三月十九日，〈遊後樂園賦〉在櫻花盛開的芳苑中拉開序曲，眼前盡是麗色蔥青，一片春意喧鬧。東南入口處唐門上懸掛的匾額，是朱舜水自己命名與題字的「後樂園」，⁽³³⁾進門之後，沿著園的南邊蜿蜒狹長的迴廊曲徑前進，時而接上浮臥川流的長橋，時而瞥見花樹外的田野風光，一路上枝蔓穿織，芬芳斑斕。漫步來到隱於花間水際的團瓢亭，⁽³⁴⁾其中安置了平安時代末期詩人一西行的塑像，⁽³⁵⁾賦文這樣描述：

中置古騷人西行，無冬無夏，露月雲風。倚杖戴笠，端居深念。沈

(30) 根據重森三玲《日本庭園史圖鑑》（東京：有光社，昭和十一年）（江戶時代初期）「後樂園」目下所述，寬文元年進入光國卿修建後樂園時期，並將原本在彌生町的大日本史編纂所搬至園內，於寬文九年三月十九日舉辦櫻花宴，朱舜水作有〈後樂園賦並序〉描寫了當時的情況。後樂園歷經江戶大地震、關東大地震燒毀部份建築物與樹林，加上明治年間於園內設置兵司，後又改成東京砲兵工廠，失去本園東部及北部，因此今日後樂園建築是整修重建後的新貌。頁18-22。

(31) 《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2。

(32) 《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3-24，以及程里堯〈日本古典園林藝術〉，《中國建築史論文選集》（臺北：明文書局，1973）頁641-647。

(33) 根據重森三玲的考察，朱舜水的題字是由御用工人太田久藏以手工方式用金屬將文字表現出來。《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4。

(34) 〈遊後樂園賦〉曰「卉木之叢，淵澄之際，有瓢如掌」，此句下有注文（未知是何人所加）「一亭兀然，名曰團瓢」。引自全集，頁4。重森三玲也談到園的南邊古時有團瓢亭，《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3。

(35) 此人原名佐藤義清（1118-1190），出家後法號西行，有《山家集》傳世，參見窪田敏夫《和歌・歌人物語》，東京：ポプラ（POPLAR）社，昭和41年，1966，頁107-115。另外在重森三玲《日本庭園史圖鑑》對後樂園的描述中，分別談到園中有團瓢亭及西行堂，頁18後樂園古圖中有團瓢亭，頁23相近地點則有西行堂而沒有標示團瓢亭，文末所附後樂園平面圖則在西行堂下括號標示（團瓢亭）；〈遊後樂園賦〉說團瓢亭「中置古騷人西行，無冬無夏」，或許說明了由於團瓢亭置西行像致後人改稱「西行堂」。

思自得，未見推敲。一丘一壑，此子宜置是中。⁽³⁶⁾

西行原名佐籐義清，出身武士家族，二十三歲出家後雲遊四海，留下許多詩歌作品。此處舜水正是從西行既是武士又成為詩人、行僧的身分轉換，點染出神遊物我、超越世俗的人格形象；塑像置於丘壑間的簡樸小亭，正足與廟堂相遠，體現逍遙山林的姿態。⁽³⁷⁾

接著順時針式的從南往西邊走，西湖、小廬山的縮景分別在左右兩邊，湖上有西湖堤，而小廬山北方有得仁堂。得仁堂祭祀太伯、夷、齊，朱舜水特別提到「龍門以冠世家列傳，元侯（光國）之志也」。《史記》以太伯與夷、齊事分為世家、列傳之首，三人皆有讓位出奔，不私天下之至德，太伯的義行甚至感動荊蠻夷族，從之來歸而立吳國。⁽³⁸⁾前文引舜水〈與陳遵之〉信中，讚美源光國讓國之舉較諸夷齊更為泯然無跡，所謂元侯之「志」，因此可以解釋為藉讓國之舉成就尊王一統的心願。固然關於夷齊典事，歷來還有一個更為大家熟知的後半段，是拒食周粟而餓死於首陽山；像朱舜水蹈海東渡，安東守約就以夷齊比其節義。⁽³⁹⁾但是針對寫作〈遊後樂園賦〉這個時期，或說是知遇於源光國以後，夷齊事典中的讓國成份就顯然比採薇或餓死來得重要。這誠然與光國個人德業有關，但同時對於朱舜水自己而言，是否也意味著更細膩地思索了亡國遺民的立場—在選擇為明朝殉死或倡明王道於異域（如太伯入荊蠻）之間，有了不同於世俗成見的體會。

遊賞活動因此在利用步履身經構畫出方向、區位之外，必然也引發神思遠想，眼與心的交遇讓外在的景觀都有了內在的寓意。在西湖邊上聽泉弄流，一方面由西湖堤實景想到蘇公陵、召伯堂，借以期勉光國卿勤治愛

(36) 引自全集，頁4。馬浮本首句讀為「中置古驪人，西行無冬無夏」，顯然未辨「西行」乃日本古詩人法號。

(37) 「一丘一壑」句出自《世說新語》〈巧藝〉篇（第12則）「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裡。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引自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臺北：宏業書局，1976）頁543。謝鯤語出〈品藻〉篇（第17則），頁386。

(38) 《史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記「遷生龍門」（頁3293），「龍門」指司馬遷。〈吳太伯世家〉（卷三十一）、〈伯夷列傳〉（卷六十一），分見頁1445、2123。

(39) 舜水〈答安東守約〉「忠孝事大，不佞才劣計庸，自揆初心，實多內疚。…賢契乃獨上推夷齊，下逮魯連，謂為義士，…不佞冒昧承此，罪戾轉深」，全集，頁161。

民；⁽⁴⁰⁾一方面潔淨昭澈的清流，又不禁令人吟詠起「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的孺子之歌；⁽⁴¹⁾後來放眼整個湖面波動蕩漾的景象，前水後水滔滔滾滾，「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舜水不禁也有「子在川上」的感嘆，⁽⁴²⁾而所謂「汨英雄於逝波」，應該是將屆七十的舜水所以直切比諸仲尼的憂憤不平。

或許正為了解脫人世的憂愁，往北的遊賞經過「通天橋」及舜水指導下完成的「圓月橋」，⁽⁴³⁾陡然一意地向上攀升，高度落差所形成的豁然開朗，甚至彷彿登仙遠遊、笑傲乾坤的姿態；⁽⁴⁴⁾當園邸的千門萬戶盡收眼底，這種軒昂意氣不但一掃前文老大傷逝之感，更重要的是烘托出源光國水戶侯國的興盛規模。所謂「下瞰千門」之樂，《史記》〈孝武本紀〉說漢武起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⁴⁵⁾後來在京都賦裡就成為描繪繁華宮苑的重要徵象，比如：

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班固〈西都賦〉)⁽⁴⁶⁾

開庭詭異，門千戶萬。(張衡〈西京賦〉)⁽⁴⁷⁾

都是表現重門疊戶，廣拓連綿。從現存後樂園古圖看來，舜水沿著蹬道攀登應該會连接到北邊的「愛宕阪」，⁽⁴⁸⁾從愛宕阪頂端可以俯瞰適才一路走過來的後樂園西南方的風光，順著阪坡下來映入眼簾的則是散布在北邊的廣大水田，前文有「縈迴鳥道，瞥見平田」，正是從南邊曲徑向北遠望阡陌。江戶時期諸侯為了讓藩士體會農家苦辛而在庭園內設置耕地的很多，後樂園的水田景象應該也有這個用意。⁽⁴⁹⁾不過，從〈遊後樂園賦〉看來，對於攀高與低降的移步換景，舜水還賦予另外一層意義：

(40) 召伯事出《詩經》〈甘棠〉(引自毛亨傳、鄭玄箋，《毛詩正義》，收入阮元審定《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重校宋本，頁54-55)，蘇堤事見《宋史》〈蘇軾傳〉，卷338(臺北：鼎文書局，1983，頁10801-10819)。

(41) 《孟子》〈離婁〉上「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引自朱熹《四書集注》孟子卷七b(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頁七。

(42) 出自《論語》〈子罕〉，引自《四書集注》論語卷五，頁五一-六。

(43) 參考《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7的首段文字敘述及頁26、27附圖。

(44) 賦文曰「飛雙黃鸝於木末，寄笑傲兮乾坤。重霄響答，下瞰千門，其為樂也融融，豈復有加於此者哉。」其中黃鸝雙飛或許典出王喬化物飛行的神術(參見《後漢書》〈方術傳〉卷82，臺北：鼎文書局，1979，頁2712)。

(45) 《史記》〈孝武本紀〉卷十二(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頁482。

(46) 引自《文選》卷一(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頁10。

(47) 同上注，頁32。

(48) 《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3。

(49) 參考《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7。

既而俯憑檐際，幡爾驚疑。吾聞君子不欲多，上人跬步之不謹，不其折而難存乎？乃瞻衡宇，越郊圻，歷叮唾，啟柴扉，出沒樵風之徑，長蟠釣月之磯，彷彿田家之樂矣。

此處引用《大戴禮記》〈勸學〉篇所謂「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⁵⁰⁾，強調君子必須言行謹慎，不可貪多驚遠，其實是為了調節上文意氣昂揚、笑傲天下的姿態，輔之以踏實穩妥的節度。就如蘇軾〈靈壁張氏園亭記〉所說：

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⁵¹⁾換言之，地勢的高低方位牽動眼界意圖，同時也隱喻人世進退朝隱的分際；從得意廟堂之上，轉而自我戒慎，甚至是嚮往山林之趣，兩種不同的人生情境也體現在園林景致的規劃上。

有一點當然必須辨明，後樂園中的田野風光是諸侯庭苑的觀賞景致之一，並不同於一般絕意仕途的隱逸居所。這可以由底下的描繪與評論文字見出：

登其堂，碻砮尋常，互道玕珉，陸離鋪茵。五色成文而不亂，小大品第以均勻，則屬寶氈氈，璀璨奪目矣。

余覽天下名園多矣，兩都帝王之居，今姑舍是。其他多傷於富貴，富貴則易俗。不者病於寒儉，寒儉則易枯。其有不肥不瘠，亦精亦雅，遠近合宜，天然高下，耕稼知勤，雜作田野，水流山峙，茅店瀟灑，小橋仄徑，迂迴容冶，則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就吾遊覽之所至，斯園殆甲於天下矣。

首段文字，是描寫水田附近亭堂及通道的地面鋪砌，運用五彩繽紛、大小均勻的玉石拼嵌而成，一眼望去就如同鋪上西域屬賓國特產的毛氈，那樣文采亮麗。明末計成《園冶》書中曾提到砌地鋪街必須達到如同織錦一般的效果，所謂「吟花席地，醉月鋪氈」⁽⁵²⁾，舜水從鋪地一事的精巧來突顯後樂園建造手法的細緻，另一方面似乎也透露了舜水在這個時候具有如同名士一般講求風雅的閒逸情致，這又可以再次說明，流亡的心情並不能以憂憤一概化約。再從所謂「屬寶氈氈」來看，《漢書》〈西域傳〉述漢代武帝時始通屬

(50) 引自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七（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頁133。

(51) 引自《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卷32，頁394。

(52) 引自計成《園冶》卷三「鋪地」（臺北：金楓出版社，1987）頁180。

賓，其民巧，善於「織罽、刺文繡」，⁽⁵³⁾由此襯托出這裡的田家風光不只是精巧，還是權貴之家才有的格局。底下的評論因此講究在不誇眩富貴、也不刻意寒儉中求取精巧雅緻的平衡表現；後樂園北邊的田野茅店，在舜水眼中，正是精工卻猶如天成的園林造景。

從水田附近可以順著迴遊道路通往原入口處唐門的方向，這時候東邊以池泉仙島為主體的景色成為遊賞重點。舟遊之前，先是一場山珍海味、桂液瓊漿的豐盛宴饗，兕觥交錯漸入愴恍之境；於是登舟溯洄，繞行蓬萊，竟彷彿有仙遊的假想。舜水這裡用「睇望丹丘」⁽⁵⁴⁾比擬池中的蓬萊島，據考證，此島以石為景，堆建成大龜背島的形狀，且有瀑布高掛，奇石險瀑令人歎為觀止。⁽⁵⁵⁾舟遊途中，舜水乘興歌詠，「戲唱吳歎以相譚」，「吳歎」出自《楚辭》〈招魂〉「吳歎蔡謳」⁽⁵⁶⁾，左思〈吳都賦〉也提到「荆艷楚舞，吳愉越吟」，⁽⁵⁷⁾蓋指吳地歌謠。這裡朱舜水特別在吟唱之前曰「余，吳人也」，與賦文開頭謙稱自己是「異邦樗朽」，為通篇兩處表明身分之語，但都沒有標誌亡國遺民的用意；換言之，吳地對比於異邦所可能牽引的諸如孤臣之悲、流亡之痛、望鄉之情，賦文中並沒有明顯觸及。也就因此，雖然是遊賞異國庭園，但不是用以對照故國之思，甚至應該說，〈遊後樂園賦〉圓融交錯櫻花、西湖、夷齊、西行、丹丘等中、日的人事風物，正顯示這時候朱舜水心中並不像初抵長崎那般「暫借一枝」的過客心態，而是可以彼此無別地融入與欣賞了。

四、流動的詮釋

〈遊後樂園賦〉透過漢代巨麗的大賦體式所展示的格局，以一片柳暗花明的喧鬧春意，替換本來已經無路可出的流亡生涯；而這很明顯超越素來「黍離之悲」、「新亭對泣」所象徵的遺民形象。就明代而言，由於士人早因廷杖酷刑以及薄俸苦貧而引發激切、浮躁甚至自虐式的生活經驗，可以說明

(53) 引自《漢書》卷九十六（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3885。

(54) 《楚辭》〈遠遊〉曰「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丹丘，晝夜常明也」。引自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頁253-254。

(55) 參考《日本庭園史圖鑑》頁24。

(56) 《楚辭補注》，頁334。

(57) 引自《文選》卷五，頁111。

代知識分子經常處於「患難」的狀態，這到了亡國之際，就直接成為明遺民的生存方式。而由明末極為豐富的關於「死」的材料看來，包括「死社稷」、「死城守」等，國亡或城陷都不可不死，將一切世變紛亂，用「死生」選擇來解決，就彷彿立下一座座「忠義」的紀念碑。⁽⁵⁸⁾那麼，我們反過來看朱舜水的事例，遺民的「不死」，就成為必須解釋、論辯的大問題。

身為明末知識份子，面對家國興亡，朱舜水從來也沒有迴避生死或者殉國的問題，而且他的問題還不只是中國境內的抗清或降清。甲申難後（1644年，崇禎帝死，清兵入關）舜水一方面因兩次徵詔不就，而帶罪逃亡；一方面奔走海外，來往安南、日本，尋求外援以復明抗清，這當中至少有仕／不仕、死／不死兩大問題要面對，而且是每到一個異國就必須再次面臨。關於仕進，為什麼不應南明徵詔？既而可以不受安南王威脅利誘，後來為什麼又接受日本宰相源光國的邀請？關於殉國，為什麼沒有像知友王翊力盡而亡？為什麼留居長崎後，眼見明室已無可振復，卻未能與國共亡？出處與生死是如此交纏錯雜的行路迷圖，對於明末知識份子而言，這種壓力隨時出現在大大小小的歧路岔口；生命的樣態（如何）與終結（為什麼）都需要一種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的解釋。

1657年，朱舜水在安南，當時安南王脅迫中原人面試，要他們作詩寫字，以便取用可以識字書記的人才。被傳喚的舜水既不作詩，後又因不下拜而觸怒國王，被囚囚五十餘天，甚至面臨死亡的威脅。舜水曾經這樣考慮，死亡固然難以避免，但是「徒死亦不足以明心」，因此雖然自裁可以免受污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⁵⁹⁾所以他一方面在安南朝廷之上，與安南王往復辯難，以明其心跡；另一方面則密草奏疏上南明的魯王，「惟恐身名埋沒於外夷，而無達於天朝」。⁽⁶⁰⁾疏文中不但說明受困安南，眼見多年經營徒勞無功，又受辱夷廷，感嘆只能「靜聽一死」；也說明崇禎帝死後所以不就徵詔，而遠走海外的緣由。顯然他並不認為清兵入關後只有消極殉死一途，反而是積極地投入復興事業；對於這個時期的朱舜水來說，沒有官職身分卻一樣表現對於家國興亡的責任承擔，沒有蒙恩受祿卻一樣以中華之臣

(58) 參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易代之際士人經驗反省·生死〉的詳細說明，頁23-57。

(59) 〈安南供役紀事〉，全集，頁303。

(60) 引自〈舜水先生行實〉，全集附錄，頁319。

抗禮於夷廷。因此單單問一個遺民最後有沒有殉死是不夠的，顯然還應該進一步從死亡構成的意義與價值去論斷。⁽⁶¹⁾

朱舜水逃過安南這一劫難後二年（1659），因為隨鄭成功北伐失敗，又開始了另一段流亡日本的旅途。亡國之民身居他鄉，為什麼沒有殉國的問題再次接踵而至。朱舜水向源光國解釋，自己不曾在朝任職、從未領受明朝俸祿，自認是以「義不當死」的書生身分而流亡海外，顯然不是從只能殉國的「忠臣」角度（包括立即自盡或失敗被殺）來省視自己。至於為何在明末絕意仕進，在安南堅拒官位之後，願意應聘任事於水戶藩國，對於這個決定，他毫不保留地說是「人生之大願」：

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之大願？⁽⁶²⁾

從這個行王道於天下的願望來說，舜水自己執守的是一個有別於「忠臣」的「志士」身分，近似孔子標舉的「士志於道」的君子典型。⁽⁶³⁾當然，不用於中國而行道海隅，令人想起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⁶⁴⁾的感嘆；國無賢君，邦則無道，孔子浮海之歎原有何去何從的茫然失落，兩千多年後，在流亡日本的朱舜水身上，卻體現為亡國遺民的人生新路。

五、未來的「經典」

所謂「經典」並非為了保存典藏，供人膜拜頂禮，反而是需要不同世代的持續閱讀與做出評論，透過「由後視昔」的不同角度，讓經典也與時俱

(61)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談到明季士大夫總要先抉擇生或死，之後才是殉國、起義、歸隱或仕敵的取向，而像是如果起義失敗又會再次面臨生死抉擇。（第八章：結論）則分別出兩種殉國類型：消極殉國是指為顧全個人名節的自殺行為；積極殉國則是承擔復興重任而持續反抗至於失敗被殺。其中並且引用朱舜水〈答安東守約〉（按：全集，頁75）評論文天祥不若張世傑「日夜裹創力戰」，說明明代士大夫對於積極殉國的高標準連文天祥也無法企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頁216-217。

(62) 〈答小宅生順問〉，全集，頁202。

(63) 《論語》〈里仁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下一則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引自朱熹《四書集注》論語二，頁十二b。

(64) 《論語》〈公冶篇〉，引自《四書集注》論語三，頁二b。

進，提供具有現代性的體驗。而朱舜水以及〈遊後樂園賦〉，更因為具有「空間移動」的因素，在作者與作品兩方面，都提供後人更多看待的可能性。

談遺民，如果涉及空間移動的因素，跨越地理藩籬之後，所有關於知識、道德、政治乃至於身份認同的種種界線，都會因此鬆動而獲得重新反思的機會。如果繼續留在明朝，與當時知識分子一樣慷慨求死，朱舜水也許成就烈士英名，但是就不會有從「亡國遺民」翻轉為「盛世新民」的朱舜水，同時也就不會有跨越國界與文化，而挪借漢大賦的文體程式，來描繪江戶「後樂園」的歡欣踴躍。這當中，朱舜水幾番自我剖析，不管是政治身分或儒士身分，從安南或日本進行反思的朱舜水，站在自我與他者「之間」，有意料之外的對話空間，再不必是「不食周粟」這樣一種「在地」、「當朝」的決絕處境。

正因為是有了間隙，出現了不一致的多元，朱舜水有機會仔細分析「志士」與「忠臣」的不同，「當死」與「義不當死」的分際，在明朝任職與在日推行儒教這兩種不同的人生取向；於今看來，這些是空間「位移」與文化「移植」之後，才可能「生產」出來的差異。而如果加上時間的作用，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成為清廷推動改革所取法的對象，而1870年代以降，赴日有黃遵憲、王韜、梁啟超、章太炎、魯迅、馬一浮等人，都曾經關注並嘗試重建朱舜水被遺忘的故事，甚至賦予新意。最明顯的是，不少人借助朱舜水來鼓動變法或革命，將推翻幕府與推翻滿清相連結，這已經不再侷限於「過往」明遺民的角色，而是對應於晚清民初的現實處境，賦予朱舜水及其作為、作品，一種「未來」的新詮釋。⁽⁶⁵⁾

1912年，朱舜水逝世230周年，移居日本250周年，日本舉辦了盛大紀念會，⁽⁶⁶⁾日人稻葉君山編成《朱舜水全集》，由曾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作序，在序文中盛讚朱舜水對於日本王政復古、維新大業的貢獻，並且認為日本所以壯盛，正因為能「統合東、西文物之精華」，而朱舜水如同「漢唐之美花，移開乎此枝」。⁽⁶⁷⁾這在日本鎖國及清廷海禁時期，都是不

(65) 關於晚清民初如何重新看待朱舜水，詳參錢明《勝國賓師——朱舜水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第四章「華夏和頌」一節，頁278-302。

(66) 關於這個紀念會及其對於中國朱舜水研究的影響，參考錢明《勝國賓師——朱舜水傳》，頁291-295、302-308。

(67) 稻葉君山編《朱舜水全集》（東京：文會堂，1912年，明治45年），書後後藤新平序文，頁1-3。

可能的說法，然而時空遷移，朱舜水卻因此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美談。而中國境內，則由湯壽潛、馬一浮創立「舜水學舍」，並於1913年出版《朱舜水全集》，湯壽潛序文中感嘆清朝康熙、雍正以來「往往不知有先生」，幸賴日本保存其遺物，更重要的是，不改其臨終遺言，「胡運一日不終，一日不願歸葬中國」，如今「既革命」，自然可以重建衣冠之墓，延續其學。⁽⁶⁸⁾顯然，朱舜水其人與其學，並不隨著明朝覆亡而被遺忘，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20世紀初，反倒成為華夏文化斷而復續的一脈薪火。

（此文改寫自〈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收入《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12月），頁193-236。）

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
- 〔漢〕毛亨傳、鄭玄箋，《毛詩正義》，收入阮元審定《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重聚宋本）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 〔南朝宋〕劉義慶原撰，楊勇著：《世說新語校箋》（臺北：宏業書局，1976）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 〔唐〕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宋〕朱熹，《四書集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
- 〔宋〕洪興祖注：《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
- 〔宋〕蘇軾：《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圖書，1975）
-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第十三冊》（臺北：鼎文書局，1983）
- 〔明〕朱之瑜著，湯壽潛刊、馬浮編：《朱舜水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63）
- 〔明〕朱之瑜著，稻葉君山編：《朱舜水全集》（東京：文會堂，1912）
-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臺北：漢京文化，1987）
-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0）

(68) 湯壽潛序，見湯壽潛刊、馬浮編《朱舜水全集》，頁1-2。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1981）

〔清〕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清〕黃遵憲著，鍾叔河輯校：《日本雜事詩》（長沙：岳麓書社出版，1985）

二、近人論著

王進祥：《朱舜水評傳》（臺北：臺灣商務，1976）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李甦平：《朱舜水》（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計成：《園冶》（臺北：金楓出版社，1987）

重森三玲：《日本庭園史圖鑑》（東京：有光社，1936）

梁啟超：《朱舜水先生年譜》（臺北：中華書局，1957 台一版）

程里堯：《中國建築史論文選集》（臺北：明文書局，1973）

窪田敏夫：《和歌・歌人物語》（東京：ポプラ〔POPLAR〕社，1966）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賴橋本：《中國歷代思想家》第七冊（臺北：臺灣商務，1978）

錢明：《勝國賓師——朱舜水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Summary

**The Scenery of the Exile:
Zhu Shun-Shui's Writing of Political Exile
and the “Roaming in the Korakuen garden Fu”**

CHENG Yu-Yu

“*Roaming in the Korakuen Garden Fu*” was completed in Zhu’s 5th year in Edo, and displays a pleasing, comfortable tone. In this Fu, Zhu appropriated prosperous and glorious scenes from the “Imperial Fu (上林賦)”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political influences and cultural contributions of the Mito School 水戶學派 that Zhu lead in Japan. The framework of the Great Fu style is clearly distinct from most other writings of exiles, such as “Sorrow of the song Shu-li 黍離之悲” or “looked at each other and wept at Hsin-ting 新亭對泣”, which cannot shake off images of poverty and difficulty. In contrast to such images of destitution, homelessness and homesickness, “*Roaming in the Korakuen Fu*” opened a window for the future on an exile, and the splendor that followed when he experienced, then overcame the enigma of personal death and political piety.